

国际移民企业的性别模式：以纽约市华裔美甲行店为例

□游天龙

[摘要] 国际移民企业特别是那些在城市经济中从事服务业的小企业，很多都是高度性别化的。“并行嵌入”理论是一个基于“多重嵌入”理论和“跨国主义”理论构建的新分析框架。基于该框架，以纽约市华裔美甲行业为个案，研究发现纽约华裔美甲行业中业已存在的性别化模式不仅受到个人的社会经济背景和家庭因素的影响，也与中美多层次的社会与经济因素、政治与制度因素产生互动。

[关键词] 并行嵌入；移民企业；性别化移民；跨国性；美甲行业

[作者简介] 游天龙，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律社会学博士。云南昆明，邮编：650091。

[中图分类号] C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21)06-0022-06

一、引言

全球移民是一个性别化的社会现象，但女性移民企业家这一群体却因为社会对女性的普遍歧视和对她们贡献的贬低、女性企业家不愿意承认自身在小企业中的地位，以及研究者自身的隐藏偏见等原因长期被忽视。^①如今，女性移民企业家在数量、企业规模、企业类别、企业分布地域以及在各经济中所占比重都在迅速提高，且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她们在推动文化多元性、提升社会凝聚力、创造就业和提高社会基础设施水平等方面的贡献，但现有文献对女性移民企业家的“(创业)过程和情景的互动是如何形塑创业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存有“关键的未知”。^②

本文作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国际移民企业研究领域过去的主导理论，比如“混合嵌入”理论等，都不同程度地轻忽了女性移民企业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女性移民企业家所处的移民身份和性别的“双重劣势”处境。^③可喜的是，因为“混合嵌入”理论自身的开放性，重视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情景的结构性作用，强调多层社会结构与企业家自主性的互动，让该理论具有用来分析女性移民企业家所受的社会、经济、制度影响的巨大潜力。^④而本文作者基于“混合嵌入”理论所创建的新理论模型——“并行嵌入”理论——则可以将女性移民企业家置于跨国性空间中分析移民企业的性别化模式。

- ① 参见 Jock Collins and Angeline Low, "Asian Femal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in Australia",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2. 1 (2010): 97-111; Deborah De Luca and Maurizio Ambrosini, "Femal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More than a Family Strateg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57. 5 (2019): 201-215; Vic-nent Nadin, "The Emergence of the Spatial Planning Approach in England", *Planning Practice & Research* 22. 1 (2007): 43-62; Mai Camilla Munkejord, "Local and Transnational Networking among Femal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Peripheral Rural Contexts: Perspectives on Russians in Finnmark, Norway",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24. 1 (2017): 7-20; Nicola Patterson and Sharon Mavin, "Women Entrepreneurs: Jumping the Corporate Ship and Gaining New Wings",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Researching Entrepreneurship* 27. 2 (2009): 173-192.
- ② 参见 Daphne Halkias and Sylva Caracatsanis, "Introduction: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ing Femal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eds. Daphne Halkias, Paul Thurman, Sylva Caracatsanis, and Nichols Harkiolakis, *Femal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mpact of a Global Phenomenon* (UK: Gower Publishing, Ltd., 2016) 44.
- ③ Mirjana Morakasic, "In and out of the Labor Market: Immigrant and Minority Women in Europe", *New Community* 19. 3 (1993): 459-483.
- ④ Friederike Welter and David Smallbone,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s on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in Challenging Environments",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49. 1 (2010): 107-125.

基于此模型,本研究对纽约市华裔美甲行业这一高度性别化的行业进行个案分析,以此讨论那些同是嵌入跨国领域、但却高度本地化的低端个体服务业中的移民企业的性别化模式。本文认为,尽管企业实体在移民输入国某处,但移民企业家的竞争优势却来自其最初在移民输出国培养的、之后在与输出国和输入国的多层次社会环境互动中不断成长起来的技能、实力和社会关系,而移民企业家的性别(本案例中为女性)则会在微观人际网络、中观市场条件和宏观政治制度环境这三个层面之间的互动中发挥不同的作用或者受到不同的限制,从而对女性移民企业家的企业经营行为产生影响。

二、国际移民企业研究的理论化建构

Kloosterman 和他的同事们在 2010 年建构了一个三层模型——“混合嵌入”模型来分析国际移民创业。^①该模型将移民企业家置于三个层面的外界影响之中,即微观层面的移民网络,中观层面的市场经济机会结构和移民输入国宏观层面的政治/制度大环境。虽然与该领域以往的理论相比,“混合嵌入”模型更加综合完善,但该模型却忽略了跨国性力量对企业家个体的全方位影响,从而完全忽视了移民输出国的结构性状况,^②且性别因素在该模型中也处于缺席状态。与此同时,虽然女性移民企业家群体日趋重要,相关研究在地理上也覆盖了从传统移民输入国、新兴移民输入国、传统移民输出国到女性权益被极大压制的中东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地,但这类文献至今缺少一个综合性框架来理解这个群

体以及她们所经营的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独特环境,也没有发现身处不同国家的不同族裔的女性移民企业家所面临的共同挑战。^③

为了回应上述挑战,在“混合嵌入”模型基础上,游天龙和周敏结合跨国企业方面的文献,提出了新的理论模型——“并行嵌入”模型。^④该模型可以被视为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混合嵌入”模型,表明移民企业家同时嵌于移民输入国和输出国两个社会的三层结构之中,且两国的三层结构之间还会产生跨越国界的相互作用。不仅如此,新的“并行嵌入”模型还在“混合嵌入”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化和补充,其中之一就是考察性别因素在三个层面是如何影响移民企业家的企业经营行为的。本文从劳动力供应的态势入手,以纽约市华裔美甲行业为例,用跨国性视角和综合性模型来理解嵌在跨国场域中的女性移民企业家所面临的来自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两方面的、多层次的环境因素。

三、纽约市华裔美甲业简述

作为一个全球都市,纽约有数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为了满足专业阶层的需求,新兴的低端服务业层出不穷并且迅速渗透到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将过去那些非常私人的生活领域商业化。^⑤这些新兴的低端服务业大多被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低技术移民所充斥,他们因为无法进入主流劳动力市场而不得不在这类低端服务业领域中找寻创业机会。^⑥

美甲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今,美甲店

① Robert C. Kloosterman, "Matching Opportunities with Resource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from a Mixed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2, 1 (2010): 25—45.

② Ulrike Schuerkens, *Global Forces and Local Life-Worlds: Social Transformations* (New York, NY: Sage, 2004).

③ Soniya Billore, Ahmad HJ Zainuddin, Norashfah Hanim Yaakop Yahaya Al-Haj, & Daphne Halkias, "Femal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A Developing Sector in Japan's Entrepreneurial Economy",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ntrepreneurship* 15, 2 (2010): 165—186.

④ Tianlong You and Min Zhou, "Simultaneous Embeddedness of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Global Forces behind the Chinese-Owned Nail Salon Industry in New York City", *American Behavior Scientist* 63, 2 (2019): 165—185.

⑤ 参见 Millian Kang, *The Managed Hand: Race, Gender, and the Body in Beauty Service Work*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Ivan Light and Steven Gold, *Ethnic Economies* (Bingley, UK: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2000); Saskia Sassen, "Global Cities and Survival Circuits", eds. Barbara Ehrenreich and Arlie Russel Hochschild, *Global Woman: Nannies, Maids, and Sex Workers in the New Economy* (New York, NY: Metropolitan Books, 2004) 254—274.

⑥ Ivan Light and Steven Gold, *Ethnic Economies* (Bingley, UK: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2000); Saskia Sassen, "Global Cities and Survival Circuits", eds. Barbara Ehrenreich and Arlie Russel Hochschild, *Global Woman: Nannies, Maids, and Sex Workers in the New Economy* (New York, NY: Metropolitan Books, 2004) 254—274.

遍布全美国，该行业 2015 年的年总收入高达 80 亿美元，且增长率极高。^① 行业快速发展带来了高工资、高就业保障和高流动率：超过 60% 的工人周薪达 827 美元，70% 的工人一半以上工作时间被预订，60% 的工人为现雇主工作少于三年。概括来说，收入丰厚让更多人加入这个快速发展的行业，也让他们有能力挑选雇主。纽约被誉为“美甲之都”，2012 年该市就有近 2 000 家美甲店，在全美国范围内数量最多且增长速度最快，这导致该行业竞争激烈且利润微薄。在纽约，该行业被 8 个政府机构监管，让店主面临严峻的法律合规要求。^②

纽约美甲行业的主导权正从韩裔移民转向华裔移民。^③ 美甲行业雇佣非法移民以及偷税漏税问题非常严重，因而该行业也是非正式经济的一部分。大多数雇主和工人都是受教育程度低、技术水平低的女性移民，他们来自中国不同地方。微信和互联网已经广泛地应用到招聘各环节，很大程度上弥合了各方的信息不对称。但纽约美甲店的数量增长赶不上纽约市消费者对美甲服务需求的增长，这导致该行业长期面临“用工荒”问题，工人议价权更大，在工资和待遇上也更高。美甲工人的主要输出国中国的一系列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变化进一步加剧了输入国美国纽约市美甲行业的“用工荒”问题，让纽约美甲业在招聘上面临更大挑战。

四、研究发现

（一）微观层面与人际关系网络有关的因素

“并行嵌入”模型凸显了移民企业家的人际关系网络的重要性，该网络能不同程度地促进移民企业家在移民输入国和输出国获得用于创业的金融资本、人才资本和社会资本。而女性企业家在微观层面面临“双重劣势”，不仅因为移民身份导致创业艰难，而且她们的女性身份和社会对于女性的性别化期待也对她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即使在美

甲行业这一女性占大多数的高度性别化行业中，性别歧视和性别角色依旧制约女性移民经营企业的野心，并且会更容易让她们在家庭关系这一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中处于更低的位置。

Nemo 是一个曼哈顿小美容院的女老板，早年 and 丈夫一起赴美。她面临的语言障碍、对美国社会和法律不了解、有限的文化水平以及美国劳动力市场对于新移民的其他直接或间接限制，这让她无法找到理想的工作，不得不在华裔美甲店从事违反当地劳动法的高强度、长时间、低工资的工作。她曾长时间没有回中国，在此期间通过定期电话联系来维持与中国亲友的关系。作为家中长女，她自觉履行义务，定期给家人汇款——包括其父母、兄弟，乃至为小一辈购置电脑和支付培训课程学费，严重延缓了她在美国积累足够资本开店创业和扩大经营的时机，为此经常引发她和丈夫的矛盾。她认为自己有责任避免国内亲人因为经济困难而无法维持生活，先后将国内数位家人请来美甲店工作，即使因此失去工作多年的员工。虽然她和她丈夫对生意贡献一样多，但面对客户，她仅仅自称是工人——因为客人一般会给提供服务的工人额外的小费，但并不会给提供服务的老板小费。刻板印象式的性别角色观也塑造了夫妻之间的分工，这导致 Nemo 的职责更加偏事务性，负责记账、看店、面试新工人和采购经营耗材，而她丈夫则更多地负责更核心的事务，比如薪资、人事、大项投资和内部装潢。Nemo 自己也为性别刻板印象所规训，认为这样的工作分配更合理，因为相比于男性雇主，女性雇主更少地受到女性工人的尊敬，也因此更难对她们进行管理。实际上，作为美容院的二把手，她虽然对丈夫的很多经营策略颇有微词，但却很少对此加以抵触。他们曾经在曼哈顿同时经营两家美容院，遇到需要调配人手的时候，她往往是疲于奔命的那个。他们的美容院以丈夫的姓氏为名，而 Nemo 甚至没有以她

① Nails Magazine, *Nails Big Book* (Torrence, CA: Nails Magazine, 2016).

② Sarah M. Nir, "The Price of Nice Nail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7, 2015, A1.

③ 参见 Karen Grigsby Bates, "Nailing the American Dream, with Polish", *National Public Radio* (2012), <http://www.npr.org/2012/06/14/154852394/with-polish-vietnamese-immigrant-community-thrives>; Jenny Choi, "Korean Nail Salons: An inside Look", *Voices of New York* (2014), <https://voicesofny.org/2014/06/korean-nail-salons-inside-look/>; Millian Kang, *The Managed Hand: Race, Gender, and the Body in Beauty Service Work*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David Kim, "Korean Nail Salons Feel Heat of Chinese Competition", *Voices of New York* (2015), <https://voicesofny.org/2015/02/korean-nail-salons-feel-heat-chinese-competition/>.

为持有者的美容院对公银行卡。

相比 Nemo, Cassey 则基本不受移民身份的影响,但她依旧难以避免女性身份和社会的性别期待对企业经营的影响。Cassey 在中国是一名成功的舞蹈演员,曾担任过顶级舞蹈大赛评委。她后来嫁给《纽约时报》一位著名记者,在美国获得高雅艺术硕士学位,说着流利英语,跻身纽约精英阶层,在美国的生活基本不受移民身份的影响。尽管她掌握了可观的人才、金融、社会资本, Cassey 最终还是未能突破性别壁垒而选择去开拓其他领域,依旧选择在美甲行业这个高度性别化的、移民垄断的行业创业。和 Nemo 类似, Cassey 也需要给从中国来投奔她的妹妹安排工作。为了符合高层对于女性的母职期待,她后来将美容院的日常经营交给妹妹,自己则花更多时间来陪伴读高中的孩子。但和那些努力在家庭与事业上平衡的美国上流女性一样, Cassey 并没有成为全职主妇,而是继续投入相当时间到美容院事业,维持着“女企业家”社会身份,处理罚单、媒体关系等复杂事务。Cassey 的成功也部分受益于她丈夫较为公平的性别意识。她丈夫不仅是一位给他们的合伙企业带来大量各种类型资本的自由派媒体人,还将具体经营事务放心交给 Cassey 去打理,这种做法为很多移民男性企业家所不及。

Linda 是另一位受制于性别身份和社会性别期待的女性。她曾是中国西北某省的执业律师,以亲属移民方式来美国,社会经济地位介于上文两者之间。但因为语言障碍以及执照不被认可,她在美国无法继续从事法律实务工作,只能在美甲行业这个尤为偏好女性工人的行业谋生。Linda 之所以选择赴美,是因为她受到母职期待的社会压力不得不给她正在读高中的孩子陪读,这导致其报酬优渥的职业生涯为中国传统性别角色观所断送。她在移民之前,作为一个自雇职业人士所带来的相对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虽然有助于她在来美国一开始就带着创业的野心去找工作,但她最终没有选择自立门户,部分是因为她被青春期孩子的母职所限,让她没有条件全身心投入到创业之中。

在美甲行业这个女性占绝大多数的行业中,美东华人美甲协会和韩裔美甲协会的主席和理事长却均为男性。在这种性别严重不平等的环境下,三位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较大的女性企业家同样面对着性别角色和社会性别期待所带来的压力,这导致她们

的事业抱负受到影响。

(二) 中观层面上与本地经济和市场有关的因素

本文的“并行嵌入”模型系统性地将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的市场态势,与跨境劳动力流动相连接。虽然移民企业家能通过跨国的人际关系网络获得移民劳动力,但是移民输出国包括性别因素在内的社会经济状况变化则会产生阻碍移民劳动力供应的结构性壁垒,从而直接影响移民企业家在移民输入国的企业竞争力。

第一,与性别有关的变化是中国年轻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给女性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和资源,大大地提高了中国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在福建这个中国最大的跨国移民输出省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从 2000 年的每 10 万人中有 2967 人上升到 2010 年的每 10 万人中有 8361 人,受过完整高中教育的人口则在 10 年间从每 10 万人中有 10602 人上升到每 10 万人中有 13876 人。其中年轻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尤为显著,因为在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下,父母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女孩的成长中,这使得女性受教育时间变得更长,初婚时间大大延后,直接导致适龄的潜在女性移民劳动力人口减少。受教育水平提高也导致了更多的就业错配,美国作为移民输入国所提供的蓝领服务业岗位不再符合中国侨乡年轻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抱负,从而导致这些年轻女性更可能前往中国的一线城市寻求职业前景更好的白领工作而非远赴海外。经济发展让中国成为通讯产业大国,这也间接导致大量年轻女性在出国之前通过网络和电话就能获悉美国低端服务业的艰辛,进一步打消了她们出国的念头。一个在华尔街附近开美甲店的店主 Amy 说,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不想来美国给人洗脚”。

第二,中国留学生富裕的家庭经济状况导致从事美甲工人兼职的留学生数量锐减。华裔美甲行业的另一个重要劳动力来源是在美国持有学生签证的中国女留学生。过去,尽管中国留学生需要向美国证明他们自身的经济能力,且移民法也基本严格禁止校外工作,但许多人还是会找一些兼职工作来减轻生活成本和学费开支的压力。对于年轻女留学生来说,她们在诸如美甲店这样的华裔小企业找到一份兼职工作并不难。因为执法机关不可能对纽约市的小企业频繁执法,所以非法打工的风险极低。因

此,本项研究中受访的美甲店主几乎都请过中国女留学生。但如今新一代的中国留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显著提高,基本不需要勤工俭学。在2000年,6万留学生几乎都是得到中国政府资助或拿到美国高校奖学金的研究生;10年后的2010年,35万留学生中的大多数是自费出国的本科生,其中大部分人4年总共花费在21.5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这当中包括昂贵的学费和同样不菲的生活开支。^①但计划生育时代的许多中国女性从小被父母宠爱,不愿意也不被父母允许去做美甲工人这样的蓝领兼职工作。而对于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女留学生来说,英语熟练、实习经验丰富、信息来源广泛的她们在美国的主流劳动力市场求职的境遇已经大大改善,更进一步减少了她们去美甲行业工作的可能。Amy的观察准确地反映了这种新形势:

现在我们找不到很多贫困的留学生。中国学生现在都很富有。他们的父母很有钱,愿意给他们尽可能多的钱,好让他们能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在过去,中国留学生经常从事餐馆、美甲店等低端的工作。现在这种学生已经没有了。学生们现在都是挎着LV的手提包,穿着BurBerry名牌服装。他们成了掏钱的客户。我们喜欢和他们做生意,但我们也需要人来给他们服务。

第三,中国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导致的“用工荒”使得蓝领阶层输出海外打工的人口减少。中国经济发展也一定程度惠及了受教育水平低的蓝领阶层,而这些人恰恰是美国低端私人服务业所急需的劳动力。因为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迅速老龄

化,人口增长率也在降低,造成了从沿海到全国的大范围“用工荒”。调查显示在沿海地区存有30%到70%的用工缺口,^②过去5年(2013—2018年)超过2000万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而所有行业的工资都以每年10%的速度在增加,增长速度远超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③仅在福建省,2016年第一季度就出现了126万个工作岗位面临103万求职者的情况。福建省适龄劳动人口总量以每年8万人的速度减少。中国的“用工荒”还导致了周边东南亚国家非法移民的大量涌入。仅2014年,广东省的执法机关就逮捕了超过5000名非法外来劳工。^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蓝领工人更愿意在中国找一份薪水丰厚、包吃包住的工作。

(三) 宏观层面上的政治体制环境有关因素

“并行嵌入”分析框架认为,在宏观层面上,移民输入国和移民输出国的政治/制度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对移民小企业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本文发现,中美两国近年的政策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移民策略,这也间接对美国低技术服务业的移民企业家的企业经营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中国一侧,自2012年起,中国各级政府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旨在通过提供初创资金、低息贷款和职业培训等措施为年轻人创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⑤在福建省,仅在2013年,地方政府就花费1300万在超过30所大专院校设立大学生创业园,为10000名大学生提供创业培训课程,孵化了353个项目。^⑥一些原本应该去纽约接手父

① 参见 Hassan Siddiq, "American Universities Eye Chinese Students", *Yale Global Online* (2013), <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ent/american-universities-eye-chinese-students>; Doug Tsuruoka, "Chinese Students Pouring Billions into U. S. Local Economies", *Asia Times* (2016), <http://www.atimes.com/article/chinese-students-pouring-billions-us-local-economies/>.

② John Mauldin, "This Is the Only Solution to China's Labor Shortage", *Business Insider* (2016),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only-solution-to-chinas-labor-shortage-2016-2>.

③ Bloomberg News, "China's Workers Are Saying Goodbye to Double-Digit Pay Raises", *Bloomberg News* (2018),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1-15/imf-says-china-must-address-shortcomings-to-lead-globalization>.

④ Global Times, "Chinese Factories Face Worker Shortage, Illegal Foreign Workers Increase Sharply", *Global Times* (2015), <http://oversea.huanqiu.com/article/2015-04/6084396.html>.

⑤ 参见 Xinhua News Agency, "Li Keqiang: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s Flourishing", *Xinhua News Agency*, September 12, 2017,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7-09/12/c_136603727.htm; Nadeem Xu, "China to Support Mass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Asia Times*, December 28, 2020, <https://asiatimes.com/2020/12/china-to-support-mass-entrepreneurship-innovation/>.

⑥ 张颖:《我省构建大学生创业绿色通道》,2014年5月28日, <http://www.fjkjcyw.cn/read.asp?id=4303>.

母生意的美甲店主的子女如今拒绝前往美国,还要他们的父母给他们在中国的创业项目投资。尽管在父母看来这些年轻人并没有做好创业经营的准备,但因为长期家庭分离而产生的愧疚感让这些父母汇款回国支持子女创业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鼓励创业的政策成功地将原本流向纽约美甲行业的人力和金融资本引导回了中国的初创企业。

在美国一侧,美国 2014 年宣布的十年有效的新签证政策也影响了中国人的移民策略。过去低技术移民在美国调整永久居留身份需要经过移民局、移民法院的层层审核,经过一到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排期才能转成申办手续。在漫长的申办阶段,申请者为确保成功,往往选择长时间持续生活在美国,因此也通常会在华裔社区找一份稳定工作养活自己,而其中女性申请者则很可能选择从事美甲行业。美国移民法烦琐的受理程序为低端服务业创造了较长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的劳动力供应。但 2014 年的新签证政策让获得赴美签证变得更为容易,且有效期大大加长也让持有者可以在较长的时间内频繁地前往美国做短期停留(多达 180 天)。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执法机关很难对短期停留的签证持有者进行严密监管和针对性执法,所以一些低技术女性移民也就不乐意从事美甲行业这种强度大、时间长、工资低的工作,而更愿意冒险从事时间短报酬高的工作,即使这类工作对女性物化程度更高。一个美甲店主 Peter 告诉我们:

现在年轻女孩都去按摩店了。……不光年轻女孩,一些中年妇女也去了。有些人做个整容,让她们自己显得年轻漂亮都可以去做按摩了。她们每个月赚很多钱。看看这些报纸上的广告,他们招聘的按摩师一个月赚 25 000 美元。在我们店,最勤快、掌握技术最多的美甲工人一个月大约赚 4 000 美元。现在只有傻子才会给我们工作。对于新人来说,如果她们要在两三个月时间赚快钱,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去做按摩,然后往返于中美之间。

而一个发生在第三国的意外也降低了低技术移民赴美获得永居的动力,从而也间接影响了纽约市美甲行业的劳动力供应。为了应对近年从中美洲国

家涌入的无陪伴儿童而引发的人道危机,奥巴马政府将处理这些“无陪伴儿童”的申请列为移民法院的优先处理案件,并把其他案件的庭审时间向后延期 4 年。^① 由于美国只有大约 250 名移民法官,移民法院案件积压严重。平均每个案件都要在法院中停留 604 天的时间。在一些城市,如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等大城市等待时间则超过 2 年。在这种情况下,申请美国永居在时间和经济上变得缺乏吸引力,而持签证频繁入境、短期停留则更经济。

五、结论

本文建立一个分析框架阐释女性移民企业家的并行嵌入以及移民小企业中存在的性别模式。本研究以该框架为指导,通过对纽约市华裔美甲店的案例研究发现,即使根植本地经济,服务本地客户,因为移民小企业本质上具有跨国性,因而该行业的性别模式也在跨国场域中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研究结果表明,移民小企业中的性别模式受到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的人际关系、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等多层次因素的影响。

本文对已有研究成果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第一,本文深入揭示了“性别”这一因素是如何通过个体—中观—宏观层面的力量来影响女性移民企业家的经营活动的,而这一分析也应适用于非移民的女企业家研究。第二,“并行嵌入”模型的性别模式分析展示了将国际移民企业研究欧美学派理论加以综合的可能性。本模型是基于国际移民企业研究欧洲学派带头人 Kloosterman 的“混合嵌入”模型而来,本身是一个去性别、去阶级、去种族的模型。而“阶级—种族—性别—交叉性”这一美国社会学界的主导范式也统治着美国的国际移民企业研究。本文展示了“并行嵌入”模型的开放性和将“性别”因素纳入分析的情况,启迪了日后将“阶级”“种族”乃至“交叉性”因素结合进来的相关研究。第三,本文暴露了现有的当代华裔移民研究中忽视中国过去 40 余年社会经济变革的巨大问题。随着中国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移民输出国,(下转第 51 页)

① 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 *Empty Benches: Underfunding of Immigration Courts Undermines Justic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 2016), <https://www.americanimmigrationcouncil.org/research/empty-benches-underfunding-immigration-courts-undermines-justice>.

四、结语

阿拉安人精神信仰和实践行为的核心是一套神灵创世、善灵与恶灵二元对立的宇宙观、世界观,人世间发生的各种幸运或不幸、健康或疾病等都是善灵和恶灵之间争斗和对抗的结果。阿拉安人根据这套善恶二元对立的信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使用巫术和占卜来医治疾病、禳灾避祸的仪式体系,作为精神信仰的实践操作。阿拉安这一整套宇宙观、精神信仰,通过他们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等口头传统表述了出来,因此口头传统还是原住民表达和传承世界观、精神信仰的载体。这一套精神信仰为现实世界存在的问题解释了原因,为人们的行为做出了规范和指导,为阿拉安人的实践行为提供了神圣的权威和历史的溯源。

史诗《伦皮恩传奇》通过讲述英雄兄弟一次次历险的故事,用具体情节清楚解说了第一次巫术治疗是如何开始的,明确地说明人类与神灵立下了关于治病祛邪约定,从此英雄们成了善灵,开始承担起为人类治疗的职责。这番解释话语为阿拉安人的巫术治疗提供了一套可以追溯、强有力、近乎终极的合理解释,使得阿拉安人的治疗仪式具备了明确

的历史权威和合法性,于是阿拉安巫术治疗就具有了可以回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史诗吟唱本身也成了巫术治疗仪式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呼唤和赞美神灵、实现和促进治疗紧密联系在一起。笔者在调查阿格巴拉欧治疗仪式时发现在仪式全过程中,方方面面都多多少少与史诗吟唱或者史诗内容相关。于是,史诗吟唱与巫术治疗的仪式实践密切结合起来,这一口头传统在阿拉安社会中不只是娱乐和教育的手段,而是被赋予了明确的治疗功能,极具应用性、现实性。

由此可见,阿拉安人的英雄史诗与神话、传说一起,共同构成了一套内容完整、情节丰富、逻辑清晰的地方性知识,全面表述和深入诠释了阿拉安人关于神灵创世、善恶二元对立的精神信仰。阿拉安人就是在这套地方性知识的指导下,进行种种巫术治疗的仪式实践在原住民看来,这些口头叙事都是曾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平日举行各种巫术仪式其实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实践自己的信仰,将自己信仰中的历史再次重演于今天的现实生活。☐

[责任编辑 李青蓓]

(上接第 27 页)

未来的研究应当重视这一因素及其变化对华裔移民包括企业经营在内各种活动的影响。

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中国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学生、职业人士,其中自然不乏女性,而相当一部分女性也会投身经商活动。本文虽然研究的是美国的女性华裔移民企业家,但研究发现同样对来华的外国女性移民企业家的经营活动有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移民企业对于移民社区的建构和发展有着突出的核心作用。加深对女性移民企业家的认

识,对于中国治理日趋庞大的外来人口以及他们所形成的社区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如何促进他们来华经商活动,而又避免出现治理难题,将是地方政府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致谢:本文基于作者 2017 年在亚裔美国研究协会年会的报告。感谢导师周敏教授(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系)对本文的立论、理论框架和资料分析等方面给予了悉心指导和具体帮助,并对本文进行的多次修改和充实。☐ [责任编辑 郭云涛]